

金融贸易史论

孔祥毅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孔祥毅, 1941 年生, 山西阳城人, 山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金融学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部级优秀专家。

主要社会兼职: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高校学科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兼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全国供销合作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金融学会理事, 山西晋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

孔祥毅教授长期从事金融理论和金融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先后主编、参编了《中央银行概论》、《中国社会主义金融理论》、《金融市场学概论》、《三省经济论衡》等专著, 教材, 工具书二十余部。主持完成省(部)级研究课题十余项, 发表论文和重要研究报告 80 余篇, 并多次获得国家 and 省部级奖励。

孔祥毅教授的名字已被《中国社会科学者大辞典》、《中国经济学学者大辞典》、《中国文化名人辞典》和《英国剑桥名人传》等收录, 1994 年被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政府授予荣誉公民证书。

目 录

• 山西商人与票号研究 •

晋商概观	(1)
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研究	(6)
山西货币经营资本研究	(47)
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	(81)
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性质	(105)
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	(112)
山西票号与清朝官吏的关系	(134)
山西钱庄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140)
山西货币商人在对外经贸中的贡献	(145)
晋商行会:自治自束自卫的商人机构	(156)
18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内蒙古南部地区的民间行会	(169)
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大盛魁	(185)
晋商兴衰与市场	(194)
发展对俄贸易是重振山西商务的契机	(197)
弘扬晋商精神,再现晋商风采	(202)
晋商今鉴	(217)
明清时期山西货币商人的金融创新	(237)

挖掘历史资料,引深晋商学研究	(245)
----------------------	-------

· 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 ·

鸦片战争后的货币制度与货币流通	(247)
外国银元流通和中国自铸银元	(266)
清末金融风潮	(272)
近代史上外国银行在中国的设立及其活动	(278)
钱庄与外商银行和票号的关系	(302)
中国资本主义银行业的产生	(308)
关于银行发展阶段划分的历史考察	(321)
中央银行制度的演变	(346)
把钱币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	(366)

· 民国山西金融史研究 ·

阎锡山的货币金融思想与实践	(373)
阎锡山与山西省银行	(387)
阎锡山早期的银行资本	(393)
蒋阎冯中原混战与晋省金融	(406)
略谈抗战前阎锡山的农村金融政策	(432)
应县广济水利股份有限公司述略	(449)
编后记·华章编就答恩师	秦援晋(451)

附图一:清朝山西商人之商路示意图

附图二:近代山西票号分布示意图

晋商概观

中国近代史上,山西商人、尤其是山西票号商人,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商路可达数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白银从各地滚滚流回乡里,置地产,起楼阁,显赫一时,为国内同行所仰慕。“山西人善于经商”,“山西人长于理财”被誉为佳话,至今传颂。

商人资本有两种形式,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源远流长,据《易·系辞》载,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又据《国语·晋语》载,晋文公称霸时,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便“工商食官”,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近年山西出土有公元4至7世纪萨珊王朝金币,虽不能据此认定隋唐时已有山西商人到过伊朗,然而山西商人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确是毋庸置疑的了。延至宋代,山西地处北宋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宋至道二年(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蕃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戎界”进行贸易,这时的山西商人已与蜀商、南商同列为有名的地方商人,显出身手。元朝结束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完备了驿站,使山西商人活动地域更加扩大,据《马可·波罗行记》说,此时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并获得了巨额利润。入明后,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已

· 原载《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之说。明王朝时期，内部政局安定，商品流通范围日益发展，商业资本空前活跃，出现了晋商、徽商、粤商、闽商、江右商、吴越商等许多商帮。晋商的活动舞台已伸向全国各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曾给在抚顺的山西、山东、河东、河西等豪商书“七大恨”令其带回关内，山西商人已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入关后，顺治帝不仅命范永斗等山西八大商家为皇商，给予种种特权，康熙帝还命山西商人随军进入外蒙古草原，除服务军需品供应外，还对草原牧民进行贸易，广阔的东北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又为山西商人的贩运贸易提供了市场。此时，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对蒙贸易，还垄断了西北市场，独占了北京商业的鳌头，当时虽有江浙、山东、潮州等地商帮也在京城逐利，但无一能与晋商争强。同时，山西商人在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州、福建等南方各省的活动也十分活跃。明时海禁森严，山西商人的势力仅以发展到全国和东南沿海为限。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雍正五年（1727年）、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多次申禁，仅特许浙闽粤人可以出海，所以晋商只有北趋以求陆路对外拓展。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准许中俄商人互市后，山西商人在恰克图相继建起大型商号有二十九家之多，各商号还在俄国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彼得堡等城市设立了分号。19世纪60年代以前，俄国对我贸易为逆差，以一种粗制的银工艺品来支付，山西商人运回的银器熔后补充了中国银两货币的不足。此外，山西商人对日本、朝鲜贸易也很活跃，曾垄断中国对日铜贸易，每年两次乘季风出海，将中国的土特产及书籍输往长崎，再由长崎贩日铜回国交与政府，补铜制钱的铜源不足，为清政府的银铜货币制度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是伴随着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而发展的。山西货币经营资本的形式,最早的是当铺,以后又有印局、帐局、钱庄、票号等。当铺,大者为当,小者为质,当铺和质店均为抵押消费信用机构。印局,专做放印子钱的生意,对城市贫民和小商贩提供短期信用。帐局,是从事对商业放款的机构,是近代中国货币经营资本中的一种独特方式。钱庄,有的地方称银号,主要从事钱币兑换业务,后来也做存款放款业务。票号,也称汇兑庄或票庄,专做异地款项划拨,总号设在山西原籍,分支机构设在全国各地以至于国外,后期也搞放款业务。不论哪种形式,都是山西商人资本的组成部分。它们通过银钱兑换、货币保管、资金借贷、异地汇兑以及过拨转帐等等货币技术性业务和信用活动,支配、营养着成千上万个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大小商号,分润着这些商号所获得的好处,也直接资助和刮剥着政府、官吏、仕儒和小生产者。近一个世纪以来,山西票号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视,给了应有的历史评价。岂不知山西商人经营的当铺、印局、帐局,特别是钱庄,在中国社会中也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被人们忽视了。从历史发展看,当铺、印局、帐局、钱庄早于票号,衰亡又晚于票号,历史寿命比票号长;按资本总额计算,当铺、印局、帐局、钱庄虽单个计算资本较少,但家数众多,总资本远比票号多;按活动地域看,山西的当铺、印局、帐局、钱庄遍设全国各地,不论在京都闹市,还是在边远乡村,就是国际舞台上,他们的活动也不比票号少。可惜这方面研究还有待于今后的发掘。不过,非常有趣的是,全国商帮众多,为什么专门从事汇兑业务的票号却为山西商人所垄断,“汇通天下”,其他商人插足不得,清末南方官僚和商人如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胡光墉等也办了票号,却都不几天就垮了,这是为什么?这不仅仅是因为晋商势力昌盛,资本雄厚,信用卓著,更重要的是晋商实行分庄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

如果从事专业汇兑的金融机构,没有遍布全国的分支网络、高度的信用和雄厚的资本,则是不可以想见的。再者,明代以来山西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也为山西票号的崛起,积累了经营管理经验,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所以,当日升昌一起,山西巨商竞相效仿,票号一业遂执中国金融之牛耳。自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财政陷入困难,被迫实行卖官制度,票号趁机开辟新的业务,积极资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以至走马上任,并代办代垫捐纳和印结,与僚结缘,遂取得了官款无息存储,至同治年间进而充当清政府捐纳军饷的办事机构,为户部解交税款,为各省关借垫京协各饷,为清政府筹借款项,承汇对国外赔款,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等。山西票号逐渐由为商业服务转为政府金融,官商相维,成了清王朝的财政支柱。

山西商人在清代的发展达到鼎盛时,南方武夷、六安、羊楼司等地茗茶被山西商人撵往蒙俄,蒙俄及北方土特产品内销江南,开拓了一个起自长江、汉水,经河南周口、开封、清化、晋城、潞安、子洪至晋中盆地,又从晋中盆地北上出雁门关、黄花梁,东北出东口(张家口)至齐齐哈尔,西北出呼伦贝尔,出西口(杀虎口)至归化、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的南北大国际商路;又开拓沿长城一线,至新疆、塔尔巴哈台至阿拉伯的东西大商路。彼时的商业行会,或以同乡,或以行业为纽带在全国各地建立。乾隆三十三年,在苏州一隅,山西钱商八十一家共建的全晋会馆至今保存完好。与此同时,在山西出现了一大批大商业家族,如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不仅开设绸缎庄、茶庄、布庄、百货店于各省城市,设当铺、钱庄、帐庄、票号于各商埠,并且置房买地,出租土地,坐收地租。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

辛亥革命,清廷垮台,票号商人失去靠山,放款不能收回,而存款逼提,使票号资本迅速崩溃。以票号为后台的钱庄、当铺以及商品经营资本,本来在鸦片战争后,“洋行”入驻,洋货涌入,横遭打击,又随着货币经营资本的衰败,商品经营资本失去了金融后盾,势单力薄,力量衰微而且祸不单行,俄国革命,外蒙独立,山西对俄蒙贸易不仅失去市场,而且连在蒙俄资本也丢失尽光,一齐退回国内。尽管阎锡山曾召集商界领袖,呼吁重振商务,然而大势已去,亦无可奈何。1931年东北沦陷,晋商不堪忍受日寇蹂躏而返回原籍。1937年,芦沟桥事变,各地晋商被迫返晋。称雄五百多年的晋商自此一败涂地。

山西商人和商人资本,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迅速发展,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封建王朝崩溃而衰败。这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山西商人所创造的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的晋商精神,当永远是山西人的精神财富;山西商人所创造的一套完整的经营思想和技术,诸如“城钱”、“谱银”、“倍成”、“厚股”、“护本”、“人身股”、“掌柜制”、以及“以盈济虚”、“抽疲转快”、“人弃我取”、建立“相与”等等,也永远为后人所借鉴。

毫无疑问,晋商作为中国近代十大商帮之首,它的作用和贡献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晋商研究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

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这是一个规律。在生产没有从属于资本以前,资本作为商人资本可以独立地优先地发展起来,这就是经营贩运贸易。马克思说:“在这种贸易上,主要利润的获取不是靠输出本国产品,而是靠对商业和一般经济都不发达的共同体在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靠对两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在这个场合,商人资本是纯粹的商业资本,同两极即以它作为媒介的各个生产部门分离了。这就是商人资本形成的一个主要源泉。”^①

正是如此,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在全国商人势力中处于十分显赫的地位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使山西商业资本受到了打击,发生了转折。

山西商人资本的发生和发展

(一)山西商品经营资本发展的历史阶段

1. 隋唐以前是山西商人资本的发轫前期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

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②的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之时,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官”,对

• 本文发表于《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7—368页。

② 《易·系辞》。

外使“轻关易道通商”^①。以后，鲁之穷士猗顿居猗氏，“用盐起”，“兴富于猗氏”。^②《孔丛子》又说，他受陶朱公之教，“大蓄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货拟王公，名驰天下”^③，今临猗县王寮村有猗顿之墓，并有陶朱公庙。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泽州（今晋城市）、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④。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⑤近年在山西出土有公元4至7世纪萨珊王朝金币^⑥，虽不能认定隋唐时期已有山西商人到过伊朗，然而山西商人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就作者所见资料，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他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2. 宋元时代是山西商人资本的发轫时期

宋代“蜀商、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⑦宋代，山西地处北宋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至道二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蕃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戎界”^⑧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庆

① 《国语·晋语》。

② 《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57—3259页。

③ 《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57—3259页。

④ 《山西资料汇编》，第266页。

⑤ 《太原县志》，《艺文》，明嘉靖版。

⑥ 山西省博物馆收藏。

⑦ 傅衣凌：《明清时代的商人和商业资本》，1956年版第3页。

⑧ 康基田：《晋乘蒐略》卷二。

历年间(11世纪40年代),宋王朝出藏绢二千余匹,市马于山西岢岚,又诏三司出绢三万匹,市马于山西各州府。其他商品交易,“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①。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②。

3. 从明代到清初是山西商人势力的发展时期

明王朝和北方的鞑靼以长城为界,山西地处中原汉族地主政权与北方蒙古贵族政权的接壤地,明王朝的军事部署主要设在山西河北北部沿长城线上,军需贸易需要商人来承担。加上明王朝内部政局安定,商品流通范围日益发展,商业资本空前活跃起来,出现了晋商、徽商、粤商、闽商、江右商、吴越商等许多商帮。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三十三个,而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今永济县)三处^③。这个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④明万历时,张瀚就其宦游所及,著《松窗梦语》说:“(黄)河以北为山西,古冀都邑也,故禹贡不言贡。自昔饶林竹纁旄玉石,今有鱼盐柿枣之利,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依边害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庶富尤甚,商贾争趋。”^⑤明末,山西商人已经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占抚顺时,对

① 康基田:《晋乘蒐略》卷二。

② 《马可·波罗行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③ 《山西资料汇编》,第266页。

④ 谢肇淛:《五杂俎》。

⑤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在抚顺的山西、山东、河东、河西等豪商书“七大恨”令其带回关内，^①可见山西商人已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化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在镇压噶尔丹叛乱时，山西商人随军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除供应军队外，还对草原牧民进行交易。从此，广阔的东北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为山西商人的贩运贸易又提供了新的市场。经过清初的发展，到乾隆、嘉庆至道光初年，山西商品经营资本处于它的黄金时代，直至民国年间仍有影响。

（二）山西商业经营资本在国内外的展

1. 垄断对蒙贸易

汉民族对蒙古游牧民族的贸易，一般都要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俗称东口和西口，为商品交流的必经之地。张家口，据顺治《云中郡志》：这里“商贾皆出山右人，而汾介居多，踵世边居，婚嫁随之。”^②道光《万全县志》说到张家口名商八大家时：“八大家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八家主之。”^③清入关后，命范永斗等为皇商，给予种种特权，允许其贩卖食盐，允许其在蒙古森林伐木出售，允许其组织山西人到新疆从事贸易。“张家口最大的企业是山西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于清初开设至光绪末年倒闭，临倒闭时，光顶身力之职员有二百九十人左右，而未顶身力之职员亦在几百人，有的说共职员一千人左右，有的说七八百人，是清朝时期对外蒙和俄国等地贸

① 《清太祖实录》卷五。

② 《云中郡志》，顺治版，卷二。

③ 《万全县志》，道光版，卷十一。

易的中国第二大型企业。”^①这个时期“每天从外地进入张家口之皮张、药材、杂物、牛马羊等可售一千两银子。”^②其他商号如“长盛川”、“大盛魁”、“大昌川”等，都是重要的旅蒙商。“大昌川”茶店院内还有熙皇帝赐予的双龙石碑，以表彰山西旅蒙商人的功绩。张家口城在清代的发展，是同山西商人对蒙贸易紧密相连的。张家口上堡的日升昌巷，下堡的锦泉兴巷，就是山西货币商人建立起来的，并是以票号、银号名称来命名的。由张家口往北经多伦至齐齐哈尔、呼伦贝尔，是山西商人对蒙古东北部贸易的一条重要商路。呼伦贝尔城即海拉尔城，是1723年（雍正元年）因该地“水草丰茂，树木丛生，禽兽繁殖，土地膏腴”，奏准建城。“于伊敏河左岸筑土房为围，划清街道，招山西行商市易，为蒙旗会集场。……城周四里余，就商户市房为垣。”至今该地还有一个正阳街，为山西宁武人聚居之地，山西人吃醋的习惯也流传到当地蒙民之中。

对蒙贸易的西口，即杀虎口，后改移归化城。据《绥远通志稿》说：“绥为山西辖境，故经商于此者多晋籍。其时贩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无阻。”这里的山西商人，分行商与坐商。行商贸易于大青山后和西营一带，需向绥远将军署领取理藩院颁发的“龙票”。这种“龙票”不仅便于清政府管理，而且对旅蒙商也是一种特殊照顾，持此“龙票”贸易者，“蒙户如有拖欠，札萨克有代为催还之责，且旗长对于此等商户，纯以礼客遇之。”^③所以，旅蒙商很少亏折，获利巨厚。赴蒙古草原贸易者，其经营地域有前营、后营及西北营路之分，前营即乌里雅苏台一带，后营即科布多一带，西北营路则是北雅尔、伊犁、古城子（奇台）、红庙子等处。这种

① 许毓如：《旧管见闻》，1980年未刊稿。

② 许毓如：《旧管见闻》，1980年未刊稿。

③ 《绥远通志稿》卷四九，民国年间抄本。

贸易,“途中均无旅店可宿,须结驼队运输,自携锅帐”。“运输之货、以绸缎、布匹、茶、糖、烟为大宗,而以其他杂货附之,运回者,以绒毛、皮毛、各种牲畜为主。”从新疆方面回来的还有白银、金砂、鹿茸、葡萄干、杏瓜之类。运回之货物在丰镇、归化、包头出售。大约每年将二十余万只羊卖给京羊庄。鹿茸开市之时,交易量日达二十万两白银,甘草约五十万银元。^①

上述行商之中,专门走草原到蒙民中去贸易的商人因为会说蒙古语,称为“通事行”。当时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它创办于康熙年间,1929年(民国十八年)倒闭。极盛时驼队有一万六千到二万峰骆驼。人们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够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其从业人员之众,有六七千人;其活动舞台之广阔,囊括内蒙各盟旗和外蒙古喀尔喀四大部、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及乌鲁木齐、库齐、伊犁、塔尔巴哈台以至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内地有北京、山西、山东、河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

2. 垄断西北市场

在我国西北地区出产许多名贵药材,如甘草、枸杞、麝香等,尤其是大量的皮毛诸类商品,须向外输出。那里需要的茶叶、布匹、绸缎需要由外地购进,从事这项交易活动的主要是山西商人。

甘草产地在内蒙西部和陕西、甘肃、宁夏北部地区,清末年间产量约八百万斤。而这里甘草的刨采、炮制、加工、买卖多系山西商人。最初是清乾隆年间,保德县人王蕊因生活困难,流落口外,在达拉特旗的一个寺庙佣工糊口,得寺庙住持信任而允刨采该庙属荆棘地的甘草而逐渐扩大,以后创办了“西碾房”,并世代相传。同时代还有定襄人张六乡之子孙,在杭棉旗刨采,设“德盛成”。保德人

^① 《绥远通志稿》卷四九,民国年间抄本。

张家开设“十盛恒”，杨家开设“义成远”，卢家开设“仁和永”，太谷李家开设“德盛亨”，忻县张家开设“永和西”，祁县张家开设“广庆泰”。从事甘草买方和卖方中介人的是甘草店，最初是嘉庆、道光年间保德马家在河口开设的“晋益恒”，光绪初年开始，又有“庆和成”、“信成”、“日生”、“公义昌”、“庆记”、“裕隆和”、“集义昌”等先后开设。通过草店之手，销往河南、河北、天津、山东、湖北、湖南、汉口、上海、香港以及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①。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有敬义泰、合盛恒、恒盛裕、庆泰亨等由山西万泉商人、平遥商人、榆次商人、猗氏、临晋商人开办。著名的宁夏枸杞，半数以上掌握在“庆泰亨”手中。在宁、蒙、甘三省交界有个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向有“小北京”之称，那里最大的商号“祥泰隆”是山西平遥人经营，当地有“先有祥泰隆，后有定远营”的谚语，它收购皮毛运销内地或天津，贩日用百货于此销售，供应蒙回汉各族人民^②。

在青海，“商业主要由山、陕两省的客商经营，其中尤其以山西人较多，来宁（西宁）时间也较早，如‘合盛裕’、‘晋益老’商号都有二百九十年以上的历史”^③。在青海的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④。在新疆塔尔巴哈台、伊犁、和阗、叶尔羌等地、“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⑤。“西藏、青海一带高山中产麝

① 伊子衡口述、阎秉乾整理：《解放前甘草和甘草行业的概况》，《包头史料荟要》第五辑。

② 许轼如：《旧管见闻》，1980年未刊稿。

③ 廖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论》，《青海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15页。

④ 任斌：《略论青海山陕会馆和山陕商帮的性质及历史作用》，《青海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

⑤ 冯家升等：《维吾尔史料简编》下册，民族出版社第438页。

香,山西闻喜人多年在打箭炉一带设立企业,收购此宗物品。”^①

3. 独占北京商业之鳌头

北京商业,自明以来山西人就很活跃,到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北京的粮食米面行,多为山西祁县商人经营;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山西襄陵人经营;北京的纸张店,多为山西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其他如颜料、染坊、干鲜水果、粥行等都是山西人占优势。专为宫廷搬运元宝的“茂盛永”,专为下层人服务的小米粥摊贩,都是山西翼城人。北京至今仍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均是山西浮山、临汾等地商人经营的企业。但是势力最大的还是经营货币信用活动的银钱商人。北京前门外的草厂胡同、施家胡同、大栅栏、粮店街一带为山西商人聚居经营之地。当时虽然江浙商人、山东商人、潮州商人等都在京城逐利,而山西商人则独占鳌头。

4. 在南方诸省的活动

“四川隆昌、荣昌、内江一带盛产夏布,为朝鲜族喜穿之衣,中国人畴昔也有穿者。经营此业者,均多山西中区人。”^②

在云南昆明的黑龙潭,笔者曾见到残碑一块,记1838年(道光十八年)建筑文昌等殿宇时,“云贵总督史捐银四十两;云南布政使口捐银三十二两;山西太原府榆次孙云汉捐银二十两”。孙氏无官衔,捐款名次紧列布政使之后,可以认定为在当地经商的山西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晋阳人周永沅在昆明金殿有三笔捐献:一是大铜鼎一尊,直径约一米多,高约一米半;二是铜殿悬挂铜制牌联一幅,长约二至三米,宽约十五至二十厘米,厚约二至四厘米;三

^① 许斌如:《旧管见闻》,1980年未刊稿。

^② 许斌如:《旧管见闻》,1980年未刊稿。